

A 建筑文化论丛
ARCHITECTURAL CULTURE

东方建筑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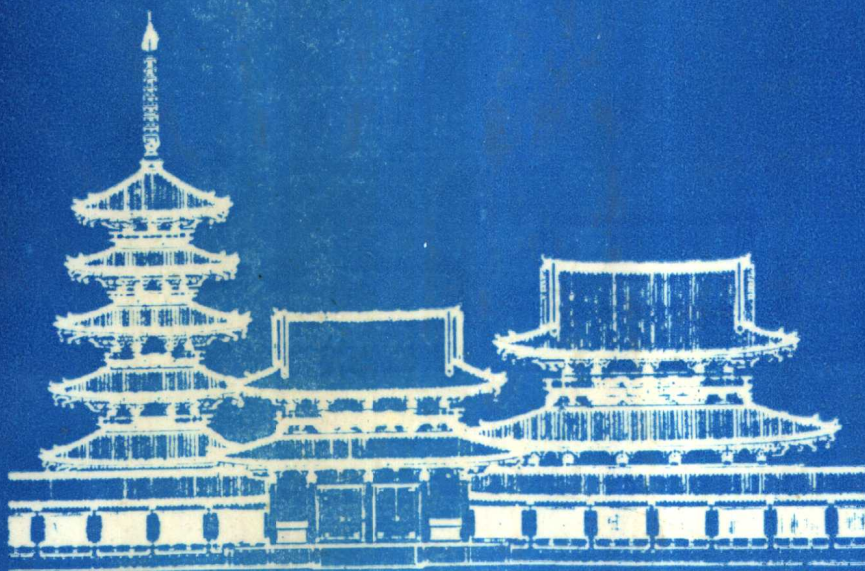
RESEARCH OF ORIENTAL ARCHITECTURE

上册

东南大学东方建筑研究室

郭湖生 主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天津大学出版社

东南大学东方建筑研究室

郭湖生 主编

东方建筑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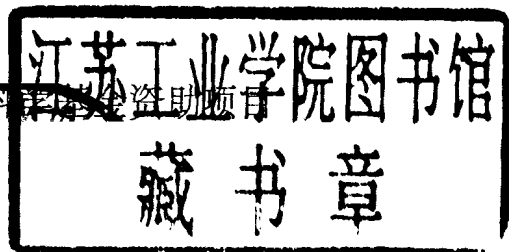
(上册)

中日古代建筑

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

张十庆 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天津大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

东方建筑文化在世界建筑文化宝库中占有与西方建筑文化同等重要的地位。研究东方建筑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建筑,也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世界建筑。

深受中国影响的日本建筑文化在东方建筑文化中独树一帜。本书上册研究日本古代建筑技术的发展情况,涉及中日建筑文化交流的史的考察,日本法隆寺大木技术的研究、中日古代建筑的尺度与空间构成比较,宋《营造法式》营造用材制度分析、以及受中国影响较大的中世禅宗样建筑设计技术考察等问题。可供有关人士阅读参考。

(津)新登字 012 号

东方建筑研究

(上下册)

郭湖生主编

张十庆 杨昌鸣 著

*

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大学内)

天津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0 字数: 499 千字

1992 年 12 月第一版 199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618-0449-0

TU.43

定价: 上册 5.50 元

下册 5.90 元

序 言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

郭湖生

自某种意义上说，建筑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许多文化现象，例如哲学、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社会生活、艺术美学以及生产经济活动等等，或多（多至全体）或少（一些象征符号和手段）通过建筑表露出来。于是可以认为，建筑自身就是文化的一种存在形式。因此，研究建筑的深层，必然接触其文化内核。而文化的具体存在千姿百态，在不同深度层次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互相交流，萌生出新品种新形态，精彩纷呈，从而构成了我们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线型发展的思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眼界，不足以完整地认识世界，也不足以正确地认识中国建筑自身。我们可以说，研究东方建筑是当中国建筑的研究达到一定阶段时必然要提出的问题。这样做，既是为了进一步理解自身，也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世界，是非常有必要的。

把地中海迤东视作东方，是欧洲人的说法。又分之为远东、中东、近东，大体上指的是亚洲和一部分北非。我们说的东方，大体也指的这一范围，只不过有我们侧重点和划分方法。中国作为古代东方文明中心之一，本身就是被研究的重点，我们自己理所当然已有不少研究。然而这里提到的东方，却主要是指中国以外和中国毗邻或接壤的地区。在我们的计划中，大致分为：

一，东北亚。包含日本、朝鲜、蒙古等国，自古这里是中国文化圈，关系密切。这里也是古代几种重要的游牧民族发祥地。

二，东南亚。包含中印半岛（Indo-China Peninsula）、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菲律宾群岛等。民族划分复杂，大体上属马来人种。早期传播小乘佛教，后来伊斯兰教进入，近代欧洲文化影响甚大。也是中国早期移民较多，华侨移民文化发达的地区。

三，南亚。包含喜马拉雅山南麓山地国家和地区（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等）、印度次大陆、锡兰岛等。是古代佛教的发祥地，对中国文化有深刻影响。喜马拉雅山地则与我国西藏地区关系密切。

四，中亚。大体上是里海、伊朗高原、阿富汗以东以迄中国的新疆地区。古代是北方诸游牧民族活动的场地，又是丝绸之路经由之地，古代多民族文化在此地交流传播。早期有祆教、聂斯脱里教，中世以后，则为伊斯兰化的诸民族（包含突厥语系与伊朗语系）的主要活动区域。在海上交通发展以前，这里是东西交通、贸易主要通道，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

何以研究东方建筑文化是为了正确认识中国自身的建筑文化呢？常有人认为中国建筑的研究已经够多了，似乎没有更多的事可做了。其实不然，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总体而言虽粗具规模，但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乃至以讹传讹的情况尚多。许多问题至今若明若暗，似是而非。除了继续深入之外，另辟途径也是必要的。东方建筑的研究可以有助于此。

我们知道，作为中国历史文化主体的汉族，本身就是融合若干古代民族而成。汉族在其发展过程中，语言语音、服饰、起居习惯、饮食等方面大为改变，离开其最初形态已经很远很远。最显著的改变之一是起居方式。汉族自古采取席地危坐的习惯，由甲骨文可以证实。

这种习惯现今日本和朝鲜尚可见到，而中国的汉族则早已改为高坐方式。最早高坐的出现，是汉代的“胡床”，源于古希腊的绳椅经中亚传至汉地。当时仅在军中临时使用。至两晋南北朝，采用高坐的北方民族进入中原，一部分融入汉族，使汉族起居方式渐起变化。高坐到唐代中期才完全取代危坐，导致古代起居习惯也随之根本改变。这一变化的动因是外来文化经北方民族中介传入和民族的融合，单纯从汉族自身是无法解答的。但这一过程迄今仍不很清晰。

来自南方的影响，例如我国西南诸省至长江中下游民间普遍采用的穿斗架结构，最先也是西南盛产杉木地区的古代先民所发展，尔后传入了汉地，而部分西南古代先民也融入了汉族，以致穿斗架成为一种广泛的区域现象。这类因民族融合交流而导致起居方式居住形式的变化还可以举一些例，如壁衣、毡罽、帐幕、以及竹材竹具的运用等等。

可以说，汉族兼有一些北方民族和一些南方民族的文化特征，许多原先的族别特征经融化吸收变形只残存为地区特征。这种地方性用单一祖源是说明不了的。而我们在研究中会发现，若干先民从境外迁来，若干为跨境而居。这些文化如不超出国界加以宏观大系统考察，即无从正确认识。

越出国界、区界作宏观大系统的考察，例如近年来日本学者提出的“照叶林文化”包含东南亚、中国南部以迄日本本土及冲绳这一广大弧形地带。其共同特征是气候与自然植被的相似、水稻栽植、牛耕、竹器与竹编工艺等。中国古代的滇文化、闽越(粤)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等也属于这一大系统。宏观地研究这一系统的萌生、发展、在中国境内的存在与变化，其文化形态、信仰崇拜、聚居形式、建筑艺术等问题，必然要和同一系统的其他支系比较而后，才能更深刻准确地认识其位置、阶段和特殊性质。我们的研究必须既考察一般，也考察特殊；既有全局，也有局部。然而理顺其中关系，谈何容易。需要长期的努力。

中国也直接受到外来文化影响。最为明显的莫过于以佛教为媒介的印度文化和希腊化的宾文化(今阿富汗地区)的影响。中国境内佛教建筑如寺、塔、石窟等类型的出现，中国的哲学、文学、音韵、绘画、雕刻、装饰等方面所受到的巨大影响，是大家所熟知的。然而，佛教最初经由“西域”传入。西域民族杂处，文化、宗教情况相当复杂，却被《汉书》上用一个“胡”字概括。我们今天必须宏观地在较大范围内细心分析西域各族，才能正确理解中国佛教文化特色的由来与形成，特别是佛教寺塔方面。

外来文化之又一例：河南巩县有一种“窑窑”，平地用砖或土坯砌筑拱券，不用模架，券身倾斜，贴砌而成。这和新疆吐鲁番土坯拱的斜砌法一样，中亚的“阿以旺”式也属同一系统。但追溯其源，据考古资料，竟早于四、五千年前的幼发拉底河上游(今叙利亚境)即已出现。究竟链的两端：西亚的两河流域和中国黄河流域中游，如何联系起来？通过哪些中介？迄今仍待研究。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理解，在研究中国建筑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外来文化因素，接壤跨境者固不少，来自远方者亦多。文化的交流早在文字出现以前很久就已开始，我们看到的只是历史长河中一小片段。何况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民族的总和才是完整的中国建筑历史。我国少数民族中跨境的如东北的朝鲜族和蒙古族，西北的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吉尔吉斯族、塔塔儿族，西南的苗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景颇族等等，对他们的研究，成为东方建筑研究的重要部分。这是我们说的“研究东方建筑文化是研究中国建筑文化到一定阶段时必然的引伸”这句话的一个道理。

东方文化的许多方面,国外已有大量研究。特别宗教方面主要的佛教、伊斯兰教、早期基督教都产生于东方,尔后传播世界,不乏专门论述。东方的一些国家如日本、印度,对其自身也作了详尽的研究。但是,我们也有研究东方的特殊优势。中国历史悠久,文献典籍丰富,在历代学者研究订正下,编年准确,考证翔实,可谓信史。中国很早就与周边地区交往,所谓中国文化圈,所谓以丝绸之路为主的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在中国历史中留下大量记载,成为研究东方必需的资料,而其丰富内容迄今仍在搜剔阐发之中。我们可以对东方研究特别是涉及中国文化方面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的理由之二。

以日本为例。日本对自身早就详尽研究,似乎已经没有更多的事可做。对中国的研究也先于我国,早就开始,如伊东忠太、关野贞、常盘大定诸氏等等。饭田须贺斯的《古代中国建筑对日本的影响》是一本很详细的专著。即令如此,还不能说毫无遗憾。1983年,我同浅野清教授一道参观奈良药师寺修复工程现场,大工西冈常一先生向我展示日本木工工具。其中钢制曲尺,一面为公制,另一面分为八寸,赫然刻着“财、病、利、义、官、劫、害、本”八个字,分明就是中国的鲁班尺。他们不知此尺传自中国,只知沿用已久,称为“天星尺”,迄今仍用于佛坛一类小木作(大木用公制)。鲁班尺的运用表示中国匠师在日本的存在,这对日本建筑影响到什么程度?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很有趣的问题。这例说明我们易于发现他人之所未见,也较有可能解决他人之所不易解。我们还要问会不会还有类似的问题呢?

再举一例。琉球(19世纪中归属日本)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很深。冲绳的多处“石敢当”,已为大家所知。其实中国文化的痕迹远不止此。那霸市中心有座蔡温桥。蔡温是福建人,清初移民琉球,被当时琉球国王尊为国师。《琉球国志》有传。迄今冲绳岛北部名护市人口处仍矗立着国师蔡温所书标有乾隆年号的石碑。那霸波上宫附近公园山头上有几座古墓,葬着琉球音乐舞蹈几种“流”(流派)的始祖。他们名字旁注明中国原有姓氏和籍贯,均为福建移民。波上宫附近的孔子庙、首里王宫的“守礼之门”、王宫附近的园觉寺、琉球王室玉陵的石刻、那霸崇元寺门外的明代碑记,处处表明中国文化的影响。二战中冲绳战争激烈,许多文化遗迹毁坏不可复睹,但是如此深厚的中国文化累积决不是无可进一步追踪无可更加研究之处的。

朝鲜半岛的平壤、汉城和庆州,越南的河内和顺化等地,都是中国文化影响集中之处。我们如能参加研究,相信也会有有趣的发现。

中国领域广大,历史悠久,许多古代民族在此生息繁衍,交流往来。中国成为东方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造诣高深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包括建筑文化作了精彩的分析论证,贡献很大。尤其因为某些西方学者囿于以希腊罗马为正统主流,东方则为非正统非主流的成见(如以往版本的Fletcher的《比较建筑史》即是一例),对东方认识有欠缺或曲解而有不完整不科学的论断,迄今未能彻底更正,更谈不上根本改观了。至于我们自己,如果看一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的条目表,就会发现,情况好不了多少,也是对东方的认识相当欠缺。一部新的、完整的、如实的世界建筑史,离不了建立一部崭新的东方建筑史。现在已是二十世纪之末尾,但是迟做总比不做好。

上面说的分区划块并不是研究东方唯一的方法。横向时期分段的方法(例如元代或蒙古帝国时期问题就相当集中突出),按宗教作专项研究的方法都是有益的、可取的。宗教建筑的研究和宗教教义、戒律、传法等方面的研究并不尽同。宗教的建筑存在及艺术表现带给我

们的信息，常伴同着宗教以外特定的社会和民族的文化特征因素。我们说载体，就指的是这种多属性的信息传达。例如，我们从西藏的密教中可感受到印度婆罗门教的影响，而日本的密宗则更多是唐代汉文化的影响。又如，同为伊斯兰教寺院，而北非、西非和中亚、印度次大陆、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就各具特色。这一类问题，值得我们重视研究。在中国，研究东方建筑的倡始者是已故建筑学家刘师敦楨先生。他曾于1959年初率我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参观了阿旃陀石窟寺等多处佛教遗址，回国后当年招收印度建筑史研究生一人，并亲自讲授印度建筑史课。我们参加了旁听。先生渊鉴卓识，高屋建瓴，多次谈到开展东方建筑研究的必要性。先生学问似海，于佛教建筑尤为精深，他选择印度为始点当与此有关。可惜1962年中印关系恶化，以致影响向印度派遣留学生的计划，随后不久的十年动乱更使这一研究被搁置起来。现在我们追随先生开辟的道路，重新展开东方建筑的研究，缅怀先师，不禁感慨万端。

近年来我们在东南大学建立了东方建筑研究室，招收博士研究生，以学位论文形式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其间曾派遣研究生赴日本爱知工业大学，在日本古建筑权威之一浅野清教授指导下进行共同培养。浅野先生为学严谨、待人宽厚，酷爱中国建筑文化，至老弥深。他为中日学术友好交流、支持东方建筑研究作出重大贡献。老人不幸于去年病逝，我们深为悼念，并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我们的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这项研究虽然意义深远，但谈不上实际应用和可预期的物质效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百事待举，许多更为急迫的基础研究已提上日程，众多项目争向自然科学基金伸手。在此情况下基金的支持实属不易。我们衷心感谢基金委员会及时而有远见的支持。

我们面前并没有现成的路。只能一边收集资料，一边熟悉地理、民族、宗教、文化、历史情况，一边发现问题、整理问题、分析问题。从与中国关系较密切的邻近地区开始，逐步扩大范围。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研究论文集，就是这一过程的初步成果。热切期待读者给以指正、批评和支持。

我们期待和各界的交流，主要是资料和情况的交流。首先是与研究东方的文化、宗教、社会、民族、艺术、历史等方面的机构及学者专家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其次希望和世界各国首先是东方各国研究东方的机构和学者个人联系和交流，特别是建立有东方研究机构的国家如日本、朝鲜（南北方）、新加坡、泰国、独联体中亚国家等等。也期望和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东方研究机构建立联系，特别是与设在美国和瑞士的专门研究提倡伊斯兰建筑的阿加汗基金组织建立学术联系，与其他研究东方宗教或艺术的团体或个人联系。我们的目的是：建立崭新的、如实的东方建筑文化史体系，籍以充实、补足现代的世界建筑史。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于东南大学东方建筑研究室

目 录

第一章 中日古代建筑文化交流的史的考察

概 说	1
第一节 古代东亚建筑文化体系的形成及性质	2
第二节 佛教建筑文化在东亚的传播及普及	3
第三节 唐建筑文化的影响及日本古代建筑体系的确立	6
第四节 宋元禅宗建筑文化的对日传播及影响	8
第五节 黄檗文化与日本近世建筑	11
小 结	12
注 释	13

第二章 法隆寺建筑大木技术的探讨

概 说	17
第一节 法隆寺建筑大木结构的构成特征	17
第二节 法隆寺建筑的尺度构成	20
第三节 法隆寺建筑大木技术的性质及其意义	25
注 释	28

第三章 中日古代建筑的尺度构成与空间构成

概 说	30
-----------	----

第一部分 中日古代建筑的尺度构成及其比较

第一节 尺度与尺度的传播	30
第二节 奈良时代建筑的尺度构成及其比较	33
第三节 唐宋辽时期建筑的尺度构成及其比较	40

第二部分 中日古代建筑的空间构成及其比较

第四节 从地盘构成看空间构成的性质与特点	52
第五节 日本建筑构成表记法中反映的空间构成的性质及特点	53
第六节 唐宋建筑构成表记法中反映的空间构成的性质及特点	55
第七节 传统空间构成规制的解体	57
注 释	59

第四章 宋《营造法式》变造用材制度探析

第一节 《营造法式》的性质及其比较	62
第二节 论八等材分模数制的构成	65
第三节 论“以材为祖,以分为制度”的大木作制度	69

注 释	77
第五章 中世禅宗样建筑的设计技术及其比较	
概 说	78
第一节 古代技术体系的继承与演变	78
第二节 中世禅宗样建筑的构成 (一)	83
第三节 中世禅宗样建筑的构成 (二)	88
注 释	94
后 记	96
参考文献	96
图 录	100

第一章 中日古代建筑文化交流的史的考察

概 说

中日建筑文化的交流，当从属于更广泛的文化交流这个大背景之下。众所周知，历史上中日两国文化之间，具有深刻的渊源和密切的交往关系。在这一交流过程中，尤其是日本古代文化，得到了外来的中国文化的塑造和推动。这使得日本文化的发展及其性质，带上了特殊的烙印。关于这一悠久的历史文化交流的过程及性质，中日两国多有研究，这使得我们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发展及性质，有了整体性的认识和理解。同时，这种整体性的认识和理解，也成为中日建筑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指导背景和基础。

日本著名中国科学史学家薮内清，在其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日本》一书中，就中日文化关系的性质指出：“我们的祖先从中国学习了文字、接受了佛教与儒教。在历学、数学、医学等学科的诸领域中，日本人学习了中国。进而，在衣、食、住的几乎所有的技术方面，也都受教于中国。随时代不同，虽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但直至明治维新为止，日本受中国文明极大的影响，是中国文明圈的一员。”⁽¹⁾

在文化的性质上，日本直至明治维新（1868年），是作为中国文明圈的一员而存在的。

关于中日文化性质及其对比，薮内清又指出：“日本成为了中国文化圈中最为优秀的国家。中国的文明，几乎均是依自力而筑成的。与此相对比的是，日本的文明，与其说是创造，还不如说是选择了模仿的道路。”⁽²⁾

中国学者指出：“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日本（古代）文化，都是接受大陆文化以后的文化。严格地说，跟朝鲜、安南一样，都是中国文化延长的一部分。”⁽³⁾极言中日文化渊源的一致。

作为中日文化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日建筑文化的关系及性质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日本建筑史学界是这样概括和认识日本古代建筑的体系及性质的：“虽然在佛教传来以前，大陆建筑的影响已被确认，但给建筑界带来巨大变革的是最先通过朝鲜半岛、尔后直接从唐传来的中国建筑样式。基于此，日本建筑的样式，直至明治维新，一直是作为中国建筑体系的一个部分而发展的。”⁽⁴⁾这是日本传统建筑性质的一个重要特色。

还应看到，日本建筑是在与中国很不相同的自然条件和文化环境内发展起来的。尽管日本建筑文化的主流源于中国建筑体系，也尽管日本建筑的发展与演变不断地受到中国建筑的影响，但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必有其民族的特色。不同的自然条件与文化环境造就了日本建筑独特的气质与风格。世界性的文化交流，并不意味着民族性的消失。文化本来就是流动的，从高处向低处，古今中外毫无例外。摄取与同化正表明了日本文化的特色及活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对先进文化的执着追求。这正如同中国南北朝、隋唐时代吸收、消化了印度佛教文化一样。日本也同样吸收、消化了中国文化。日本建筑的发展史正如伊东忠太所评价的那样：“是外来建筑的摄取与同化的历

史”。⁽⁵⁾

在接受大陆文明之后，文明起步远晚于中国的日本，其建筑的发展，却在相对而言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中国用了漫长岁月所取得的发展及进步，并走在中国的前面，跨入了现代建筑的行列。吸收欧洲近代文明的日本人，也正是曾经吸收唐宋文化的日本人。其中不无值得深思的东西。文化的比较，使人从中获得历史的经验。从日本文化发展上可以看到：善于吸收异民族文化的能力，恰表明的是一个民族的活力。

文化是世界性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指出：“我们现在谁也离不开谁，是其它民族的思想培育了我们的才智……。不论我们知道不知道，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是世界公民……。印度、中国和日本的文化成了我们的思想源泉，而我们的思想又哺育着现代的印度、中国和日本”。

愿作为世界公民的现代中国，从日本及世界其它各民族的文化中，学到更多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第一节 古代东亚建筑文化体系的形成及性质

世界文化若大分之，可分为东西两大体系，东方文化体系（东方的概念姑且限定于亚洲大陆）则由三大系统构成。即：

1. 西亚的巴比伦文化系
2. 南亚的印度文化系
3. 东亚的中国文化系

此三大文化体系，各以其发源地为中心，向四周波及、扩散，形成了相应的文化影响圈。以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为发源地的中国系文化，向东扩展的结果，形成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东亚中国系文化圈。其组成包括中国、朝鲜、日本、渤海及琉球等国。其特点为，皆以中国文化为基调，在文化的诸方面表现出相应的共通性，在文化的发展及演变上，带有系统的整体性及连动性的特征。

东亚中国系文化圈形成之初，即表现出以佛教为主体、以中国为中心的佛教国家群的特征。其中以中国、朝鲜、日本三者的关系最为稳定，且最具代表性（图1）。相应地，中、日、朝三国的建筑关系也最为密切。我们不可能把建筑的发展与支持它的文化割裂开来，东亚中国系建筑文化圈在文化大背景支持下的形成与发展表明了这一点。

总的来说，东亚建筑文化圈的形成，是以佛教建筑为基础和纽带的。因而，佛教文化在东亚的传播与普及是东亚建筑文化圈形成的标志。正如中国的佛教来自于西域，东亚的佛教则源于中国。具体地说，来自于西域的佛教，在中国形成中国佛教，然后传播至东亚诸国。先是进入朝鲜半岛的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再从朝鲜半岛流入日本。相应地，中国佛教建筑也随之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人类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宗教文化所构成。建筑文化的精华也基本上是反映于宗教建筑之上。佛教建筑构成了东亚建筑文化体系的骨干，历代佛教建筑之传播和影响也构成了东亚建筑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

作为东亚中国建筑文化圈上的一环，日本及朝鲜建筑表现出了如下共同的体系特征：⁽⁶⁾

1. 采取中国建筑结构体系的主体形式。即梁、柱、斗拱结构体系。
2. 在唐建筑文化的影响之下，采用律令制度下的建筑生产组织形成。
3. 建筑生产工具的一致（木工具、石工具等）。
4. 建筑之精华所在的宗教建筑、都城及宫殿采取中国传统的形式与布局。
5. 建筑的发展与演变表现出与中国建筑密切相关的相关性及连动性。

作为一种共享的建筑技术体系，必有其内在的规制和约定。其技术属性，无论受任何外在影响，都不会轻易地消失，而且理应有形而下的表现。这些形而下的表现，又都将成为反映共同技术体系内在规制和约定的特征。中、日、朝建筑所共有的侧脚、生起、推山、反宇等技术现象，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表现。

中日建筑文化的交往，是东亚建筑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内容，姑且以魏晋南北朝中国佛教建筑文化在东亚的传播作为中日建筑文化交往之始，那么，至日本文化上全面倒向西方的明治维新止，中日两国建筑文化的交往，至少也持续了一千五百年以上。

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存在，不言而喻，自有其民族的独特性，同时，日本文化在形成过程中，融合吸收了来自于多方面的文化因素，也使其文化的构成，带上了相应的特色。与中国建筑文化的密切交往，是日本传统建筑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上的最重要的特色。

第二节 佛教建筑文化在东亚的传播与普及

早在远古，日本列岛便漂离了大陆，成为孤岛，朝鲜呈半岛状与大陆相接。是佛教的传播与普及，使得日本孤岛在文化上与大陆联成一体。民俗学与考古学的研究表明，佛教史前，中日之间已经存在着相当的接触和交往。在初期，大陆对海东孤岛的认识，仅朦胧于想像中的海上仙山。传说中的徐福，曾率五百童男童女，由山东蓬莱出海，采集长生不老之药，未果。海船最后到达“太阳升起的地方”——日本。^{〔7〕}至东汉，对日本已颇有了解。班固所撰《汉书》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是两千年前，中国人眼中的海东日本。^{〔8〕}

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变革，为公元前二百年至公元三百年期间的变革，史称“弥生时代”。变革来自于大陆的以水稻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文化的冲击。据考，这是以长江下游为中心的稻作文化向四方传播的结果。传播的路线有多说，其中最为有力的是从长江入海口到山东省南部一带的海岸，然后再直接跨海到日本。^{〔9〕}民俗学上的大量事实也揭示了弥生文化源于南中国长江流域下游。这一文化在建筑上表现为干阑建筑的形式（日本称为高床式建筑）。日本民族学学者鸟越宪三郎先生从史学的立场提出了倭族论，^{〔10〕}建筑学者若林弘子则从建筑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证，^{〔11〕}提出日本建筑史上所出现的干阑式建筑是基于水稻农耕生产形态之上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建筑形态。倭族的初民在中国云南省滇池湖畔成功地进行了稻作的人工栽培，并在水稻农耕及干阑式建筑的伴随下，向四方移动、迁徙。沿扬子江而下往东迁徙的一群中，又有一部分成为渡至日本列岛之倭人。也就是通过这些倭人，将水稻文化和干阑式建筑传入了日本。稻作氏族与干阑建筑具有不可分的关联。日本出土的家屋文镜及铜铎上表现有这一类稻作文化圈内共通的建筑形式，并与

云南地区古代建筑形象以及现今该地少数民族建筑的形式一致(图2)。历史上自遣唐使以来,日本积极汲取北中国的中原文化,但那仅是作为一种上层文化的表现。在此之前以及作为庶民真正的生活基础则源于南中国以及东南亚一带的文化。近年来,文化人类学领域中,将世界文明分为两大源流。即所谓的照叶树林文化与硬叶树林文化。^[12]照叶树林文化又被称为水稻的文明,是东亚中国、日本以及东南亚文明的母体。其中心源地被设定为“东亚半月弧”地域(图4),正为中国的云南省处。日本的干阑式建筑,在二千数百年前,随着水稻农耕技术,沿着照叶树林文化地带,越山渡海,传至日本的可能性为学者们所指出。

事实上,这一时期南中国建筑文化的影响已经波及日本。伴随着水稻农耕文明而传入日本的干阑建筑形式,赋予日本建筑以决定性的性格。即所谓高床式建筑的出现,并成为日本建筑造型的原形之一(图3)。日本在接纳水稻农耕文明之后,便成为东南亚建筑文化圈的一个伙伴。

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以白马寺为始的佛教建筑随之在中国出现。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达极盛,并以中国佛教的形式向外辐射。中国佛教犹如一根文化纽带,将东亚诸国联成一体。随着佛教的传播而带来的佛教建筑的普及,标志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建筑文化圈的形成。

佛教建筑随佛教的传播通过朝鲜半岛进入日本,这在中日建筑关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其意义在于:以此为契机,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移入日本。从此,日本建筑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建筑文化的汲取是间接的,是通过朝鲜半岛而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朝鲜半岛的三国,不但自己吸收了中国的建筑文化,而且还在中国建筑传入日本的过程中,充当了传播的桥梁和老师。

乐浪是早期中国文化向外辐射的据点。公元前108年,汉武帝于朝鲜半岛设乐浪等四郡,汉文化予朝鲜半岛以重大影响。史称乐浪文化。汉代文化、技术席卷周边各地。公元313年,高句丽灭乐浪郡,朝鲜半岛进入高句丽、百济、新罗鼎立的三国时代。中国相应地为东晋至南北朝时期,日本则为古坟时代中期。

这一时期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及百济与中国交往密切。高句丽至公元668年为唐高宗所灭为止,一直保持着位于朝鲜北部至中国东北部的强国地位。关于其建筑于《魏志·高丽传》及《旧唐书》中有所描述,^[13]佛寺、宫殿兴盛。从交流关系上看,高句丽似主要摄取的是中国北部的建筑样式。其实构不存,但在高句丽的古坟壁画中保留有当时的建筑形象,是早期中国系建筑的珍贵资料,并与早期中国北系建筑形成很好的参照(图5-1~3)。

与高句丽相对照的是,朝鲜半岛三国中的百济,除遣使往中国北朝以外,自公元372年向东晋朝贡以后,与南朝的交往频繁。据《三国史记》记载,百济于公元384年,从东晋输入佛教,佛教建筑也随之于翌年出现。南朝在建筑上当予百济以极大影响。百济时代木构虽不存,但考古及文献记载表明,百济文化与南朝文化关系极密切,建筑当也不例外。百济公州宋山里六号坟砖铭文“梁官瓦为师矣”,即示其一端。中国正史《梁书·百济传》记有:“中大通六年(534)、大同七年(541),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百济佛寺随之隆盛了起来。百济时代所遗存建筑有“大

唐平百济塔”（石构、660年）等。

朝鲜半岛三国中，新罗的佛教传入较迟，且间接传自高句丽。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同时与南朝和北朝交往。文献记载表明，六世纪中叶以后，文化的输入主要来自于南朝。佛寺造营兴盛，其中以皇龙寺（553年创建）规模最大，建筑技术也已达相当的水平。根据《三国遗事》记载，645年兴建的皇龙寺九层塔，“铁盘以上高42尺，已下一百八十三尺”。

要之，这一时期朝鲜半岛上的三国，在文化上与中国南北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各有偏重地摄取南朝与北朝的建筑文化。严格地说，都是一种中国南北朝文化的移植，并且相互之间形成一种复合、交杂的状态。但由于地理、文化及外交上的因素，高句丽或许更偏重于一些对北朝建筑文化的摄取，而百济则受南朝的影响似乎更大。百济与南朝特别是与梁的文化关系，对日本飞鸟时代建筑的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南北朝佛教建筑向日本传播的中介，百济与高句丽对日本的影响较大，尤其是与南朝交往密切的百济。公元552年，佛教从百济传入日本，日本以此为标志，从古坟时代进入飞鸟时代。百济不仅将佛教传入了日本，并且还向日本送去了建造寺院的工匠。据《日本书纪》记载：敏达朝时（577年），百济向日本贡纳造佛工及造寺工各一人；崇峻朝时（588年），造寺工二人、炉盘工一人、瓦工四人及画工一人。于是，当时的大豪族苏我氏，立即使用了来自百济的工匠，从588年开始，营建日本最初的佛寺法兴寺（又称飞鸟寺）。以飞鸟寺为代表的佛教寺院的出现，使得日本建筑在体系上，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关于飞鸟时代的建筑样式，无实物得以参照，其体系所属，日人伊东忠太主张属中国北朝系，传播途径为：

北朝→高句丽→日本飞鸟

自40年代起，以关野贞为代表的南朝系说，渐成为有力之说。即传播关系为：

南朝→百济→日本飞鸟

日本飞鸟时代建筑的成份，当甚复杂。首先作为文化之源的中国，南北二朝分立；作为传播中介的半岛，也呈三国鼎立状态。时间与地域因素的交差、传播与交流过程的复杂，都必影响飞鸟时代建筑的性质及样式。根据文化交流的关系，基本上可以推定：飞鸟样式与半岛的百济、并通过百济与中国的南朝关系密切。

四世纪初至五世纪后期，北方始终处于战乱之中，而以江南建康为都的南朝，则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中心，并被认为是汉文化的正统所在。或许当时的外族会对南朝文化更加偏爱一些。

现存世界上最古之木构建筑为日本奈良法隆寺建筑。关于其样式的性质及源流，多有争论。据《日本书纪》记载，法隆寺于天智九年（760）烧失。^[14]因此，现存法隆寺建筑当为其后再建之构，年代上约成于7世纪末至八世纪初的奈良时代前期。^[15]但在样式及技术上却与大体上同期的、反映初唐建筑样式的白凤样式（如白凤时期的药师寺东塔等）甚异。从样式及技术成份上分析，法隆寺建筑显然反映的是较其再建年代为早的建筑样式与技术。可以认为法隆寺建筑保持了初唐建筑样式直接传入日本之前、来自于朝鲜半岛三国的建筑形式。从当时的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之间的建筑交流关系来看，当为朝鲜半岛

上所吸收、积淀和交杂的中国南北朝、隋（某些成份甚至有可能更早）的建筑形式的再现（图 6）。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早期的伽蓝布局形式。除了我们已经熟知的轴线对称的前塔后殿布局形式（如四天王寺）以外，还出现有如飞鸟寺那样的一塔三殿的布局形式。至 7 世纪中期，更出现了殿、塔左右并置的非对称性的布局形式，成为双塔式布局的先声。法隆寺伽蓝即为典型的非对称性布局形式^{〔16〕}（图 7）。

关于这一时期中国、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相互之间的文化关系，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均以中国文化为祖型。或者不如说存在着中国为祖父、朝鲜半岛为父、日本列岛为子这样的传承关系。”^{〔17〕}

1972 年（昭和 43 年）的高松冢壁画的发现，再次确认了日本古代文化与包括朝鲜、中国在内的东亚文化之深刻的关联性，表明了日本古代文化是作为东亚文化的一环而成立的这一性质。

第三节 唐建筑文化的影响及日本古代建筑体系的确立

开皇九年（589），隋文帝统一了分裂近三百年之久的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重又回到了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公元 617 年，隋亡。618 年，唐王朝建立。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外来文化所形成的庞大的唐文化体系，于七世纪至十世纪之间，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世界性文化。

唐文化对外影响最大的地域为东亚。在东亚范围，形成了以唐为中心的、包括渤海、高句丽、百济、新罗及日本等国的唐文化影响圈。唐与周边诸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所谓“万国衣冠朝长安”的君臣、联盟的关系。

朝鲜半岛上，新罗借唐远征军之力，先后灭百济与高句丽。朝鲜半岛统一，进入统一新罗时代，并在大量吸收唐文化的基础上，达朝鲜艺术的鼎盛时期。

公元 607 年，圣德太子派出遣隋使，开始了对隋、唐文化的直接输入。随着大化改新（645 年）及不断的遣唐使的派遣，七世纪后半以后，唐文化的影响在日本显著地表现了出来，时值日本奈良时代的前期。

对世界性文化唐文化的导入，使得日本走向国际化，一举与世界连在了一起。在文化传播上，以长安为中心的丝绸之路，西达地中海，东则延至奈良平城京。日本在全面吸收了唐文化之后，作为仅次于唐的东亚强国登场。^{〔18〕}

都城是演出律令制度的中央舞台。随着律令制度的传播，都城文化在东亚诸国展开。日本以藤原京（694～710 年）和平城京（710～784 年）为中心，展开了白凤文化与天平文化，是为奈良时代的前、后期。并于天平时代，达日本古典文化的黄金时代。中国都城的构成理念，在日本于藤原京上初次确立，并于平城京上得到发展及完善。

随着律令制度在日本的确立，律令制度下的建筑生产组织方式也随之进入日本。建筑生产趋向高度的组织化、技术化。以唐将作监为基础的木工寮为其律令建筑生产组织的基本形式。大化改新（645 年）之初，模仿唐制所设置的八省百官制度中的建筑营缮官司，

采取的是唐将作监的形式。⁽¹⁹⁾ 大约在八世纪左右,改为木工寮的形式。⁽²⁰⁾ 在营缮制度上多模仿唐制,典章制度的内容及形式上的相近乃至一致即示其一端。⁽²¹⁾

这一时期对唐文化的摄取以模仿为特色。越是中国风味的,就越受到当时贵族们的喜爱。“本朝制度,多拟唐家”,⁽²²⁾ 正反映的是这一特色。当时的遣唐使在唐文化的输入上,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右记》永长元年(1096)十月十一日条有如下记载:平安宫“大极殿者是大唐大明宫含元殿之体也,遣唐使常副申也,一事不违彼官,是依有兴事所记付也”。所谓“遣唐使常副申也”,表示无图,而是依遣唐使之报告。从大明宫含元殿遗址及复原和平安宫大极殿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在宫殿制度上对唐文化的受容程度。

从奈良时代开始,寺院的造营隆盛了起来,佛教建筑成为建筑的主流。这一时期,日本留学僧将在中国兴起的佛教学说,逐一传到日本,形成了日本所谓的“南都六宗”。唐代寺院的形式及建筑技术也随之不断传入日本。如西明寺,为唐长安名寺,与日本人唐留学僧关系密切。据文献记载,八唐僧道慈律师,曾“偷图取西明寺结构之体”,回国后,仿长安西明寺,主持建造了平城京大安寺。⁽²³⁾

这一时期,日本对唐文化的热情及吸收能力是惊人的。在不长的时期内,其建筑样式迅速地从飞鸟样式过渡到奈良时代前期的以初唐样式为基础的白凤样式(如药师寺东塔)。然后又向中国的盛唐样式发展,形成了所谓的天平样式(如唐招提寺金堂),天平时期为日本佛教寺院的最盛期,以天平17年(745)东大寺的造营达顶点。宏伟巨大的东大寺金堂(11×7间、重檐庑殿),在规模尺度上,远胜于同时代的唐朝最高等级建筑大明宫的含元殿。⁽²⁴⁾ 这不但显示了极大的宗教热情,同时也表明,当时日本木构建筑技术水平之高,已不甘落于唐朝之后了。

从建筑样式上看,日本建筑从白凤样式发展至以唐招提寺金堂为代表的天平样式,已逐渐趋于成熟和定型化,并作为日本传统的古典样式,直至近世而无多大改变。这一样式被称为“日本样”或“和样”,名称上虽冠以“和”,但实质上反映的是唐代建筑样式的日本化。

进入平安时代(794~1185年)后,随着唐代密教的兴盛,日本僧侣渡唐巡礼五台圣迹、遍访长安名寺求法者甚多。其中僧侣最澄渡唐于天台山学法,空海渡唐于长安青龙寺拜师求法。其后二人相继回国,最澄开日本天台宗,创比睿山延历寺;空海开日本真言宗,创高野山金刚峰寺。密教在日本展开,密教的山地寺院以及密教建筑(如真言堂、灌顶堂、常行堂及法华堂等)随之在日本兴起。

公元894年,日本以晚唐之乱为由,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此后三百年为日本所谓的国风时代——藤原时代。在建筑上,这是个奈良时代所产生的唐风建筑日本化的时代。在风格上有了较大的转变。从浑厚、宏大的唐风,趋向纤细、优美的贵族化风格。这也与当时宗教上的净土信仰密切相关。日本在进入藤原时代之后净土教盛行。

佛教中的阿弥陀信仰,称为净土教。其为向往阿弥陀极乐净土往生的信仰。净土教创造了一个秽土和净土,两者互相依存,净土教理论也在其上展开。将净土境界造型化,是导入信仰的有效手段。与净土变相图是作为净土理念的造型化一样,净土寺院造型同样也表现的是净土理念。寺院其本身成为极乐净土在人间的再现,表现出净土般的优美与华丽。平等院凤凰堂及中尊寺金色堂为其典型表现。唐代的净土寺院虽不存,但通过唐代敦

煌“西方净土变”壁画中所反映的寺院形象与藤原时代净土寺院的比较，则不难看出其相似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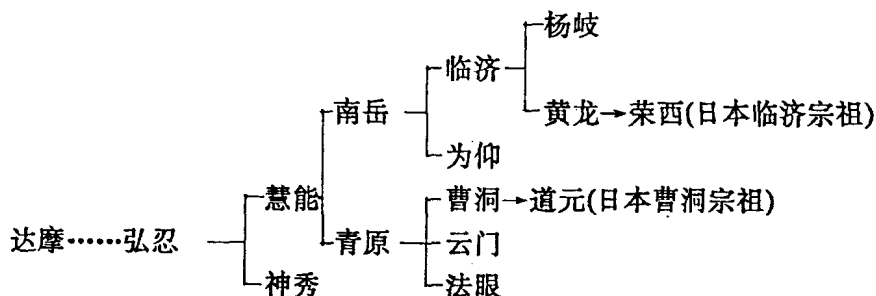
第四节 宋元禅宗建筑文化的对日传播及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各宗之中，以禅宗最为中国化，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也最为显著。并且在日本中世之后，对日本文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1870～1966年）的评价最为贴切：“在某种程度上，禅造就了日本的性格，禅也表现了日本的性格。”^{〔25〕}

六世纪由达摩传入中国的禅宗，传至慧能与神秀时，分为南北二宗。唐末五代相继的社会混乱及排佛政策，使得北方佛教显著衰退，而南宗却得到很大的发展。宋室南迁之后，临济宗独盛，其下又出黄龙、杨岐二派，禅宗于南宋时，达烂熟时期。一提及中国佛教，几乎只限于禅宗了。

自九世纪末，日本停止遣唐使的派遣以来，中日之间的文化交往趋于减少，至宋王朝统一，日宋交通贸易日渐兴盛，僧侣往来日益频繁，宋文化再度涌入日本。日本蒙受南宋禅的影响，则为势在必然。

南宋禅由中日僧侣的相互往来，传入了日本。入宋僧荣西传临济宗之黄龙派至日本，被尊为日本临济宗始祖；入宋僧道元传曹洞宗至日本，开日本曹洞宗。南宋禅中，以临济宗之杨岐派为最盛，其对日本禅宗的影响也为最大。传入日本的禅宗流派共二十四流，^{〔26〕}皆来自于渡日中国僧及入宋和入元的日本僧的传入。其中曹洞宗三流，临济宗二十一流。临济宗二十一流中，除荣西承的是黄龙派之外，其余二十流均承的是杨岐派。这现象也正反映的是当时中国禅宗界的状况及中日禅宗文化交流的背景。所承系谱简略如下：



南宋朝廷偏安江左，大量入宋僧巡礼、游历之地，均局限于以南宋之都临安为中心的江浙之地。同时大部分入宋僧多为学禅，而禅宗名利几乎也都分布在以江浙二省为中心的江南地区。

禅宗于初期并无专门禅寺，至唐中叶，百丈怀海首创禅居之法。江南之地，直至五代，吴越王钱弘俶归依禅法，乃改江南教寺为禅寺。经北宋至南宋，江南禅寺达极盛。于宋宁宗时代，据卫王史弥远的奏议，对江南禅寺品定寺格等级，始有禅宗的五山十刹之